

校园里的背叛者

——对布尔迪厄《国家精英》相关问题的解读

陈卓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布尔迪厄认为, 作为“超出了常规的命运”的群体, “背叛者”在教育权力场域的争夺战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 但往往因为其所占的微小比例而被教育研究者忽视。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背叛者, “寻入歧途者”和“误入歧途者”在背叛方向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 但在争夺权力资本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目的。不同背叛者在教育场域的权力争夺战中所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种种策略能取得一定的背叛效果, 但无论是在存在论意义上, 还是现实意义上, 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 因而这种背叛也很不彻底。

关键词: 背叛者; 布尔迪厄; 权力场域; 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4-0566-07

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 布尔迪厄为人们建构了一个庞杂而又精致的社会学理论系统。作为该系统的核心的文化资本理论在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教育与社会分层方面, 已经成为相关研究中无法绕过的一道关卡。布氏教育理论十分丰富, 其中关于背叛者的思想颇有新意, 同时也极富挑战性。借助于布尔迪厄的名著《国家精英》中关于这些“超出了常规的命运”的背叛者的研究, 可以揭示这“极少数人”在教育场域权力争夺战中发挥的重要性, 进而发现在各种权力场域中, 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在结构上根深蒂固的对应关系。

一、真假背叛者

布尔迪厄理论研究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理论与调查密切结合, 两者相互印证, 相辅相成, 浑然一体。在对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法国中学优等生会考^①中的优胜者进行问卷调查时, 布尔迪厄发现, 社会出身和政治观点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这在其他大部分学科的优胜者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但是, 法语和哲学优胜者却颠倒了, 或者说, 混淆了这一点。也就是说,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法语、哲学等“需要才华

和天赋的学科”本应当体现出在这个领域占多数的出身上层社会的优胜者的“素质”(或者说“品性”), 他们应该是谦逊的, 保守的, 文质彬彬的, 温文尔雅的; 但是, 调查发现, 他们反而比下层社会和底层学科(这两者是对应的)的人表现得更左, 他们背叛了自身的阶级, 或者确切点说, 他们背叛了他们出身阶级所要求的“素质”。对此, 布尔迪厄解释说: “上述选择表明了他们赞同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表现和价值准则, 确切地说, 这些选择表明了他们的一种意识: 他们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对现今社会定义中铭刻在每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日志上的问题进行表态来塑造知识分子的某种形象。”^{[1](26)}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的争夺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次调查的时间: 1968年5月风暴结束之后。理解了这一点, 就明白了背叛者之所以背叛的原因。

实际上, 布尔迪厄在另一处提到: “其实, 学校的上流精英就是一种国家精英。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因为他们打着献身于‘公共服务’的旗帜, 为国家的‘上层利益’效力, 只是他们在提供此项服务的时候, 必须能够兼顾到他们自身的利益。”^{[1](670)}这种与“拉大旗帜作虎皮”相似的做法, 实际上是高贵者表现出来的“低姿态”——实际上这种“低姿态”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高贵的”属性的表现, 至少也是一种

收稿日期: 2008-03-04; 修回日期: 2008-06-10

作者简介: 陈卓(1981-), 男, 汉族, 湖南怀化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06级秋季教育学原理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教育基本理论、德育原理与高等教育学。

“时髦”。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教育界以及知识界并不少见。因此，这种背叛能在多大程度上称之为“背叛”，还是值得商榷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假背叛”。这种“背叛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

但是的确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背叛者，与前者相比，他们的背叛不仅仅是一种迎合时尚的姿态，更多的是由于所在场域的社会位置或者他们在场域中的相对位置(其实两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的变化而造成的，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这才是真正的背叛者。布尔迪厄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强调主客观结构之间的对应性。在《国家精英》的开篇他就谈到：“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principes de vision*)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1}尽管如此，布尔迪厄也没有忽视少数的例外，他在研究中一再提到的“普遍看来”“在大多数的时候”“在统计上”“在某些情况下”“几个反例”“个别例外”“……除外”“截然相反的例子”等等，就注意到了这些背叛者的存在。

最近几十年，一种专门为背叛者量身打造的教育领域的“阿尔杰神话”^②在中国不断地上演，正如下面这位成功者而言：“的确，考试的确是一辈子的事情。正是考试，给了我升学的机会，如果没有考试，……机会就为零。……对于贫寒子弟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后恢复高考制度，笔者不可能从考试中走来，逐步升学，最后顺利进入北大攻读学士学位、硕士学位，乃至博士学位，今天我也不可能学着我的美国老师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的样子自豪地说：‘自己出身贫寒之家，但今天也可以自豪地自称为学者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自幼失去了父亲，家境贫寒，但后来通过考试上了大学，现在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2]这种依靠个人努力，克服千难万险，过关斩将，最终达到成功彼岸的故事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言说者还是阅读者，都能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力量。

人们对于这类现象并不陌生，然而对于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却未必清楚。在教育领域，学业再生产方式遵循着统计学的逻辑(当然不排除极少数的例外)，倾向于对学业称号进行不断的再分配，进而实现在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权力位置的再分配。明白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让人们感觉到教育公平步伐的加快；另一方面，他们却发现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这就

是教育再生产所发挥的无形作用，这是一种社会炼金术。同时，也要注意，教育“这种再分配与假设中的在完全偶然情况下实施的再分配情形是绝对不一样的，因而它不是对先行的分配进行机械的、一模一样的再生产。”^{[1](286)}简单点说，教育场域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是自由公正的和谐天地；但也不能对布尔迪厄的理论做出简单机械的理解，认为他就是出身决定论者，正如他自己说的：“无论人们衡量得多么精确，社会出身都只能是一个显示器，而不是一切的根源：它可以用来发现文化资本移转的不同方式。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1](177)}正是因为这种狭小的缝隙的存在，才给了芸芸众生以希望，也才能赋予教育以宗教般的魔力，让人们对它投以无限的热情和虔诚。

缝隙的存在造就了极少数背叛者，通过对那些为数不多甚至寥寥无几的背叛者的分析，可以发现文化资本移转的不同方式。因为“位置与其占有者的习性之间从来就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1](317)}，由背叛者的背叛带来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已有的权力场域格局，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变革才有希望。这就是真正的背叛者肩负的使命——尽管他们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二、背叛的方向和目的

虽然没有明确区分，但布尔迪厄分别针对两种背叛方向进行了研究。第一种是“寻入歧途者”，第二种是“误入歧途者”。他们都“超出了常规的命运”，背叛了原属于自己的群体，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从较低的等级往往更高的等级上升，后者恰恰相反^③。

在分析法国会考制度时，布尔迪厄对一些公立中学的文科预备班进行了调查，旨在揭示这些名牌大学预备班的学生在“有选择的封闭”下逐渐建构日后的“自行遴选行为”的过程。他发现，通过神化与认同的辩证关联，名牌大学选择那些因为得到了它的选择而选择了它的人^{[1](175)}。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些人“超出了常规的命运”，这些考入了预备班的人不同于其他的大多数，他们来自于社会空间被支配区域(工人子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自身阶层的“背叛者”。这些“背叛者”“一开始就由于某些次要的优越条件而有别于他人”，例如他们的家庭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相对来说都比较高——在工人家庭出身的理科预备班学生中，48%的人的祖父属于中等阶层，而在所有就

业人口中,中等阶层仅占18%;另外33.5%的理科预备班学生的母亲和25%的文科预备班学生的母亲(职业都是工人)持有中学第一阶段结业证书。工人子女还因为前期学业上的异常成功而有别于其他同窗——97%的理科预备班学生和91%的文科预备班学生(都是工人的子女)在中学阶段未留过级,而理科预备班和文科预备班学生此项比例的平均数分别为83%和88.5%;同样,理科预备班和文科预备班学生中分别有66.5%和81%的人至少得过两次优异成绩奖,而这两项的平均数分别为48%和64.5%^{[1](177-178)}。

与“寻入歧途者”不同,“误入歧途者”走的是另一个方向。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教育机构,学生分数分布的结构与他们家庭的职业是相互对应的,分数分布的结构与这些职业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结构也完全相似。这一切就是“像一架机器”似的学业分类不断地将社会类别转化为学业类别的结果。然而,学业机制并非总是有效,它偶尔也有失灵的时候。那些“背叛者”就是这种失灵情况下的产物。“异常的轨道将一部分学生引到了与他们所属的位置(这些位置原本应该是属于他们的,而他们也应该是属于这些位置的)对立的那个极点。”^{[1](317)}例如大、中学教师或小学教员的子女误入巴黎高等商学院,银行家、工业家的子女误入巴黎高师。布尔迪厄重点分析了从出身社会极点的场域来到知识型学校场域的学生,这其实是一种“衰退”,是从第一等级“退”到了第二等级。这种权力场域的衰退必然带来主体态度和感受的变化。例如在作为一等大学的国家行政学院,工商界业主的后代从来不出现在左派或者极左派的行列中,在同样作为一等大学的巴黎高等商学院也很少;但是,在二等大学塞夫尔和于尔姆,工商界业主的后代却常常都归顺于左派,并且自称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就同样出身的学生而言,选择右派在于尔姆属于个别情况,而在巴黎高等商学院则比较普遍^{[1](319-320)}。

尽管方向不同,具体情况更是千差万别,但背叛的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争夺权力资本,在权力场域占据一席之地。在权力场域,“能够介入这些斗争的力量,以及对这些力量是进行保守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引导,都取决于人们所说的不同类别的资本之间的‘交换率’(或者‘转换率’),也就是说,取决于所有这些策略旨在维护或者改变的东西本身(这种维护或者改变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类别的资本及其合法性的各种表现进行维护或批判来实现的)。”^{[1](457)}这里面存在种种策略,背叛就是其中之一,各种不同的背叛策略也都

是围绕着权力资本的争夺而运作的。只不过这种运作方式的精细巧妙,往往连参与者本人都未曾意识到。例如下面的这位成功者的个人经历回顾:“在临近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之时,更大的‘恐惧感’萦绕在心头:将来的人生路向何方?对此自己一无所知、一片茫然。唯一的实感是不管将来的路指向何方,目前的路却实实在在地就在脚下,能够确信的就是‘脚踏实地’凭着‘感觉’往前走!于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又一次验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的伟大魅力。根据自己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觉得:不管进机关对别人有多么美好的前景,或凭借‘财经专业’的稀缺性资源如何能‘经济’地成就别人多少‘财富人生’,对于我自己来说,最现实、最理想的职业选择就是当一个‘教书匠’。尽管我们那时的职业选择还是‘一次分配定终身’的计划配置,我心里没有任何‘紧张’感,因为到大学当老师几乎等于被‘发配’或‘流放’的一种职业去向,别的同学都唯恐躲之不及,而这却给了我一个绝好的‘选择’机会,可以‘从容自得’而获之。宣布分配去向时,同学们听到的我去学校都‘哄堂大笑’,但我在心里窃喜,感到无尚荣幸!这可以说说是平生第一次所进行的不自主的重大自愿选择了——从此走上了我20多年来‘相濡以沫’、作为终生事业和人生使命的教育职业生涯。”^{[3](79)}

这是一位60年代出生的学者的夫子自道,这位在豫西农村的“地穴”里长大的贫穷农民“意外地”通过了1979年的高考,并在“老师凭借他们的‘人生经验’力加劝诫”下选择了在当时看来“将来有出路、有前途”的山西财经学院财经专业,在临近大学毕业时作出了“平生第一次所进行的不自主的重大自愿选择”^{[3](73-84)}。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识时务”者的明智选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通过教育机构,受教育者已经学会了泰然接受“学业分类学”的作用,这种作用支配着当事人的“志向”朝着学业评判事先设定好的某某学科或者某某专业运动^{[1](68-69)}。在当时的背景下,面对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人生道路,作者根据自己当时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做出了对于自己来说“最现实”同时又是“最理想”的选择——当一个“教书匠”,并在与“财富人生”的对比中,“从容自得”地“选择”本来就属于他的职业——虽然这种职业在同类人眼中却无异于“发配”或“流放”。在教育场域,“任何一次成功的社会化过程都趋向于使行动者成为自己命运的同谋”,布尔迪厄这话说得很尖刻,但这种令人不快的表述后面的道理却是不容忽视的:“即便是

最动听的赞美也常常会暴露出最不知羞耻的事实：人们总是将被支配的那些品质与诸如顺从、谦逊、谨慎、拒绝荣誉、正直之类的德行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德行能够让人们接受更低的位置，而又不至于因为过度投入却收获甚微而愤恨不平；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事情。”^{[1](84)}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愤恨不平，反而发现了“心中窃喜”和“无尚荣幸”，这除了证明背叛者在背叛过程中达到的主客的高度统一，还能有什么其他更重要的东西呢？

三、背叛的道路和策略

为了说明高等教育机构场域的差异化原则，布尔迪厄分别“按照继承所得的文化资本的总量”和“按照学业资本的持有量和继承所得资本的结构”，对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和若干个名牌大学进行了剖析，并绘制了高等教育机构空间图、名牌大学场域社会、文化、学业属性空间图等一系列图表，生动直观地展示出法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场域的纵横交错结构图。“纵”“横”交错在一起，便可以发现高等教育机构场域“结构上的双重对应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两大鸿沟，即“普通大学的学生和名牌大学的学生之间”的鸿沟和“不同名牌大学的学生们中间”的鸿沟。两大鸿沟的相互交织造成了名牌大学空间的X状交叉的结构。透过这种交叉的结构，可以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与一定位置实际联系的根源其实就存在于个人的轨道与个人出身类别的模式轨道之间的客观差距之中，就是说，存在于已经走过的轨道的倾向与可能的人生历程的模式倾向之间的差异之中”^{[1](321)}。也就是在这种不同轨道之间，“寻入歧途者”和“误入歧途者”找到那本来就属于他们自身的不同道路，在通往各自目标的道路上，他们采取了适合于自身的不同策略。

对于“寻入歧途者”而言，为了实现“在特殊情况下与他们所出身的群体的分离”^{[1](179)}，“那些不适合新空间或者感到不适合新空间的人惟一能做的好像就是排斥那些排斥他们的东西，把自己的命运变成一种选择，同时将与他们发源地人群的模态轨道联系在一起的临界位置发展到极端，除此之外，别无办法。”^{[1](318)}这是一条令人兴奋不已的康庄大道，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就离人们羡慕的成功目标越近；同时，这也是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一路上百转千回、机关重重，一旦踏出了第一步，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为了生存下去，

他们必须“与传统决裂”，必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必须“一条道走到黑”。所以，当那些处于二流社会场域中的小学教员或者大、中学教师的子女出现在像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高等商业学院这样的一流教育场域中时，这些“寻入歧途者”实际上从来不会象他们那些仍然处于二流世界中的大多数同窗一样出现在右派或者左派的中心。

是什么让非精英家庭出身的技术工人家庭的学生占据了精英大学的位置？答案是：由于进入名牌大学的选拔是极其严格的，因而对于农民、工人或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学生来说，进入名牌大学的可能性甚微；于是，在以前的学习中早已存在的超级选拔效应在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出身于工人、农民、小职员家庭的极少数学生是他们所属阶层的“奇迹”：入学的概率确实达到了最低值，以至于可以归之于神奇或偶然的意外。因此，这些经受了淘汰的幸存者与他们出身的阶层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在这个“寻入歧途”的过程中，寥寥可数的幸存者必须调动以往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所积累的一切文化资本，从中提炼出尽可能多的“一开始就由于某些次要的优越条件而有别于他人”的“神奇因子”，例如相对超出同等人的知识储备和应试的能力，由于某种说不清的主客观原因造成的较之他的同伴更为突出热情，甚至是让人一望就难以忘却的出众的相貌，等等，从而把自己与自己以往属于的阶层区分开来，还是凭借这些东西，通过新的团体的测试，最终融入到新家庭的怀抱。

这样往往导致这些第一种背叛者们不自觉地实施着“对父亲进行双重谋杀”^{[1](181)}——既否认他身上尚存的百姓意识，又否认他已有的小资产阶级习性；既否认他的皈依，又否认他的变节；既否认他与人的亲密联系，又否认他对人的轻蔑，等等。所以说，“文人在诗化乡村，商人在觊觎乡村，官人在议论乡村，只是没有人生活在乡村”^[4]。这种谋杀不仅是双重的，也是双向的，谋杀的对象不仅是代表原来阶层的“父亲”，还包括了现在阶层的新“权贵”。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那些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就可可见一斑，王朔的话很有代表性：“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的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我也认识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偏见，但每当一个知识分子刚刚令我摆脱了偏见，立刻会有另一个知识分子出现，用他的言

行将我推回原处。”^[5]出身于平民的知识分子(虽然他并不承认这一“封号”)王朔,用平民的粗俗对知识分子的高贵进行无情的嘲弄,这正是“双重谋杀”的表现形式。

如前面所提到的,对于“误入歧途者”而言,他们的道路与“寻入歧途者”恰恰相反,他们走的是“下坡路”。由于是从权力场域的世俗支配极点向知识型学校迁移,他们的背叛带有更多的情不愿不乐意,因为倾向性的看法是,即使这些迁移的外在表现和实际体验都称得上是有选择的转变,但是背地里仍难免被看作是一种衰退。因为在现今社会,知识虽是力量,但权力更有力量。所以,这些“误入歧途者”虽然与进入精英群体中的精英们出身相同,但由于身处低一等级的位置,便产生了与他们原本出身相反的观点。

当然,这种姿态只是“误入歧途者”的一种“反应性行为”,“当他们踏上在社会关系上属于他们的那条道路时,只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只能取得平凡的成就,这时,其他人或许会当作一项荣誉来接受的职位,对于他们却是一种令人无法不气恼的忍受。”^{[1](321)}这也是能够理解的,“一等人”进入“二等领域”,自然无法自豪,更甭提成功——原本属于二等人的成功对来自一等领域的人而言,恰恰是耻辱。但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如果仅仅是气恼甚至愤怒,而不是“改变心态”“适应环境”,那么他们可能连这第二流的位置也会失去,从而加入到更为“悲惨”的群体中去。在这种不需要教育的教育机制作用下,反强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变成了正强化。因此,来自权力场域的霸权位置并且作了逆向选择的那些学生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背离了他们原始空间里已经心照不宣地被承认并且悄悄地存在于他们无意识中的等级。比如说,出身于工商业主和高级官员家庭的巴黎高师学生,比那些所作的选择符合所属等级的学生更倾向于背离他们出身所属的人群的模式选择。所以,与那些本来就属于二流场域的学生相比,这些“寻入歧途者”往往更加明显甚至激烈地表现出现在这个场域所要求的“素质”。他们必须通过对原先所属的优越阶层的激烈的厌恶和背叛,表明对现在所属阶层的衷心 and 热爱。——没有人对此做过培训,也没有任何专题讲座或其他形式的教育,甚至连提都没人提起,但是人人知道,包括这些“误入歧途者”自己,一切都心照不宣地进行着。除了方向上的差异,这种作用机制与“寻入歧途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尽管有个别例外,但是这些例外都可以在模型本身的逻辑里得到解释。”^{[1](269)}

四、背叛的成效和局限

背叛只是一种行为,一种做法,一种经历,一种轨迹,至于它最终成效如何,能在起点位置与终点位置之间拉出多长的距离,能激励受到激励的教育者朝着预期的目标走多远,能多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权力格局,这却是个绝大的未知数。对于“寻入歧途者”而言,背叛效果具有两面性,在某些方面,它的确能产生一定的功效,并常常以“天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无论是从存在论意义上,还是从现实意义上看,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背叛者由于其背叛的身份和“离经叛道”的行为,客观上有利于促成变革——“那些位置突兀的行动者往往构成革新,甚至是颠覆的根源”^{[1](549)}。至于那些“误入歧途者”,实际上在他们那“身不由己”的表述背后,隐藏的也是一种迂回的策略。同时,不应忽视的是,这种背叛和“离经叛道”丝毫也不能证明他们摆脱了学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换句话说,是无法摆脱的。

诚如布尔迪厄指出的,“行动者或许建构了社会现实,或许进行了以推行自己观点为目的的斗争和妥协,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带着他们自己的关注原则,而所以这些观点、利益和关注原则又是由他们在这个他们企图改变或者维护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1](2-3)}实际上布尔迪厄的思路与马克思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就曾说过:“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6]需要注意的是“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这个提法,在这里,马克思是从“传统”和“教育”两个方面就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进行分析的,这种作用,与布尔迪厄所说的“场域”(“位置”)对“斗争和妥协”的“性习”的决定作用大体上是一致的^④。

可以这么说,尽管教育体制表面上对它涉及的学生作了最大程度的随意重组,以便彻底消除他们的原始位置与最终位置之间的任何对应性,制造一种公正的表象,但是这个体制还是倾向于使先前那个差异空

间，也就是在教育体制介入之前将学生分离开来的那个差异空间得以永存——至少在统计学方面是如此。面对如此庞大的体制机器，而且是精髓和元气渗透到了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的精致机器，渺小的个人显得无能为力。——实际上，文化资本对人的影响甚至比政治资本更加根深蒂固，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拒绝一种政治体制的人，虽然不多，但古往今来尚不鲜见，名垂史册者，各朝各代均不乏其人；但能够跳出文化制约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要做到这一点，就象要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困难。

从现实意义上看，对于“寻入歧途者”而言，由于他们“先天”的劣势(除了文化资本中的学业资本，其他方面均敌不过现在的同类)，似乎已经注定了在新的起跑线上他们跑不了多远。因为学业资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是按照纯学业标准强制推行的这些轻微修正紧接着又被更改了，甚至被废除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尽管颇为荒诞：学业竞争的加剧最终使那些为逃避学业评判提供途径的教学机构极大地强化了它们的位置。”^{[1](400)}实际上，只要看看那些“寻入歧途者”在新天地中的不协调、不适应，以及那些“误入歧途者”层出不穷的“补救”策略和措施，就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鉴于此，我们不能忽视了前面提到的这些“背叛者”的重要特性：“一开始就由于某些次要的优越条件而有别于他人”，人们在盛赞这些天才们的天赋时，往往忽视了这些优越条件。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善于把穷人表现得卓越不凡”的卢梭，虽然他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贫困潦倒的幼年生活并没有把他排斥在知识之外，相反，他受到了聪明贤淑的母亲和嗜书如命的父亲(他是钟表匠)的巨大影响：“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起初，父亲不过是想利用这些有趣的读物叫我练习阅读，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个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往往通宵达旦。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孩子气呢。’”^[7]年幼的卢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7岁时他就将家里的书籍遍览无余，于是他外出借书阅读，如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莫里的几部剧本等等，他都读过，并深受感染，以至于有一天，他在桌旁叙说斯契瓦拉的事迹，在座的人

全都惊讶地看到他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之上，来表演斯契瓦拉的英雄壮举。“毫无疑问，被视作早熟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文化继承的一种表现的，它与所有这些成功的因素是紧密相连的。”^{[1](34)}这种被人们称之为“早熟”的“天赋”背后隐藏的是容易忽视的成长轨迹；缺少这种天赋的人，实际上也就是缺少这些优越条件的人，也就是注定了必须泰然地接受悲惨命运的人。

对于“误入歧途者”而言，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不是来自外在的挑战，而是源自内心的阻碍；他们面临的敌人，与其说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上的相对的弱者，不如说是他们自己那颗失衡的心，对于他们而言，“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俗语真是道出了发自肺腑的心声。从他们离开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场域，来到了新的地盘之后积极甚至过度的表现可见一斑：在大多数学校，工程师和自由职业者的子女只是宣称很少参加宗教活动，而在巴黎高师的同类人中，却有更多的人(相对而言)声称不属于任何宗教，然而在那些仍然忠于自己传统的学生中，则有更多的人宣称经常参加宗教活动^{[1](320)}。

不难发现，在这种关系背后，隐藏着一种“骇人的矛盾性”^{[1](324)}，教育系统这个特殊的再生产机构要想发挥它的最大效应，尤其是要发挥它在合法化方面的强大效应，就必须迫使那些对于这个再生产方式享有特权，并且有望于从中得益的人做出非凡的努力，使他们置身于无尽的焦虑之中，因为它必须在所有人心目中激起希望；但是它只能满足其中的个别人，成功者永远只是极少数，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大多数人，只能在近乎梦幻般的憧憬中默默地仰望，默默地牺牲。这种紧张关系随着它在权力再分配中影响力的扩大而增强，因而，它却永远也无法得到完全的缓解。背叛者肩负着冲击甚至颠覆已有权力场域的使命，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希望。但是，这种希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说背叛的彻底性有多大，)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 会考是法国筛选国家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学业分类机制。当前法国的招生考试制度，综合大学招收新生一般依赖“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名牌大学例如大学的招生，一般依赖高中后预备班基础上严格的“选拔性考试”。整个考试体系分为普通教育的考试与技术教育的考试，它们体现着法国选择性教育的分流制度、教育多轨制等传统。

- ② 19 世纪的美国充满着梦想。美国作家霍瑞西·阿尔杰创作的小说中,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故事,即生活在底层的穷孩子依靠勤劳工作最后发家致富。通过这类故事,阿尔杰塑造了一个神话: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艰苦的工作,人们可以拥有巨额财富,达到成功的巅峰。这类故事的虚幻性,在当时就有经济学家,即后来被制度学派尊为始祖的凡勃仑在著名的《有闲阶级论》里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揭露。
- ③ 需要指出的是,“寻入歧途者”与“误入歧途者”是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中的提法,但布氏并未把它们分别与两种不同方向的背叛联系起来;而是更多地在同一个意思上使用这两个词,往往指的是从一流等级向二流等级流动。对于那些从二流等级流向一流等级的情况,他在另外一处分析中称之为“超出了常规的命运”。本文现在的提法,是根据汉语特点对布氏理论的修正和发挥。
- ④ 两者的差别在于,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较之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外延更为广阔,它不仅包括物质的,也包含精神的因素(实际上,在“场域”内部,物质对精神也是起着决定作用的,这从布尔迪厄对“位置”的强调可见一斑;在另外的著作中,他还特别指出了文化资本的“遮蔽”功能:“从物质性‘经济’资本演化而来并以一种虚假的面目出现的象征资本(即“文化资本”——引者注),按照它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掩盖其自身是一种源自‘物质’形态资本的事实,并且此后也能够继续掩盖这一事实,创造着一种固

有的效用。”参见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87)。但如果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角度看,马克思无疑会同意布尔迪厄的看法。事实上,马克思的观点就是布尔迪厄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参考文献:

- [1] 布尔迪厄. 国家精英: 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 杨亚平.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2] 毛寿龙. 从考试中走来, 从考试中走出[A]. 曹宝印. 精神历程: 36 位当代学人自述[C].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200-201.
- [3] 李宝元. 一个农村孩子的进城路——我从“潘晓困惑”到“四十不惑”的人生感悟[A]. 曹宝印. 精神历程: 36 位当代学人自述[C].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 [4] 吴再. 怪味杂感[Z]. 杂文选刊, 2005, (2-下): 18.
- [5] 王朔. 无知者无畏[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107.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M]. 149.
- [7] 卢梭. 忏悔录[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6.

The traitors in school ——The explanations on the relevent issues in *The State Nobility* by Bourdieu

CHEN Zhuo

(College of Educ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As a group who “has surpassed the conventional destiny”, the trai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petition of educational power field, but they are often neglected by the education researchers because of their small proportion in the whole field. By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s, we can distinguish the false traitors from the true one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raitors, and although they share the common aim in competing the power in the education field, those who “seek to do”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who “have to do” in the directions. Though various kinds of traitors have their own way and strategy, and achieved some effects, their limitations are obvious and betrayals are not thorough both in the sense of ontolog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Traitor; Bourdieu; power field; cultural capital

[编辑: 汪晓]